

儒释道在中国发展的过程特点及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onfucianism-Buddhism-Taoism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黄心川
(中國, 中国社会科学院)

《 Abstract 》

The concrete,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the Chinese toward the aim of communal harmony conditioned their approach toward philosophical differences. Ideological conflicts were seen, not only by the politicians but by the intellectuals themselves, to threaten societal well-being. Harmonious interaction was finally more important to these thinkers than abstract issues of who had arrived at the 'truth'. Perhaps the most obvious illustration of the way the Chinese handled their theoretical conflicts is to be found in mutual accommodation of the three emergent traditions of Chinese culture,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Beginning in the Han dynasty (206 BC-AD 200), the diverse themes inherited from the competing 'hundred schools' of pre-imperial China were harmonized within Confucianism as it ascended to become the state ideology.

The harmony among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trend in China, is very important research subject at contemporary circumstance. For its cultural influences to surrounding nations, such as Korea, Japan and Vietnam etc., are so crucial.

※Key words :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the mutual conflicts Confucianism-Buddhism-Taoism, the harmony of Confucianism-Buddhism-Taoism, Zen-buddhism, Neo-Confucianism
유교, 불교, 도교 삼교정립(三教鼎立), 삼교합일(三教合一), 선종(禪宗), 송명리학(宋明理學)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相互融合与斗争，特别是以儒学学说为基础的“三教合一”的情况，构成了中国近千年来思想文化发展的总画面，因之，研究“三教合一”的种种关系，不仅使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总趋势和规律，以及“三教合一”在封建皇权控制下所起的社会作用，也可以了解“三教合一”对中国及周围的邻国宗教、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所起的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I . 儒释道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和多元文化国家，宗教、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长远的历史。在先秦以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崇拜天帝、祖先为主要特征的宗法性宗教，这是儒教的前身。在先秦时期，儒学则是一种以政治、伦理为主的学说，它缺乏哲学的内涵，疏于思维和论证的方法，因此在战国分立时代的百家争鸣中没有占得主导和地位。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之学，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后，出现了两汉经学，经学是对儒学的第一次改造。他们在解释儒学经典中提出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基本法度，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并附以阴阳五行学说等的思想体系，经学家们在他们的儒学中引进了神学的内涵，儒学开始儒教化。他们对至圣先师进行祭祀，使孔子祭祀成为和天地百神、祖先崇拜并列的三大祭祀系统之一。在东汉时，张陵在四川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同时吸收某些原始宗教信仰、巫术和神仙方术等创立了道教。在公元前，外来的印度佛教开始传入汉地，当时人们只把它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佛教为了求得自己生存和发展，不能不向当时占有支配地位的儒家靠拢，并在哲学思想上依附于“老”“庄”和玄学，沦为道家的附庸。在三国时期，由于大批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华，从事译经、传教的工作，这为以后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广泛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南北朝时，由于佛教受到帝王的信仰和重视，印度佛教经过改造以后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逐渐在民间扎下根来，并取得重要的发展，至隋唐时代达到了鼎盛时期，形成了许多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佛教的宗派和学派，并传播到了中国的周围邻近的国家。佛教在建立中国民族化的宗派和理论体系时摄取了大量的儒、道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与儒、道进行了喋喋不休、震动全国上下的争论乃至流血斗争，儒、释、道形成了鼎足之势。佛教在唐末，由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日益呈现衰颓之势，在宋初一度复苏。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普度大批僧人，重编大藏经；南宋偏安一隅，江南佛教虽然保持了一定的繁荣，但佛教总的趋势在衰落。在此期间，佛教与儒、道结合，“三教合一”呈现出总的发展趋势。在北宋期间，道教进入了全盛时期，北宋几位统治者(真宗、徽宗)都自称为教主道君皇帝，采取了一系列崇道措施，因此，道众倍增，宫观规模日益扩大，神仙系列也更为芜杂，由于道教经论日益增加，开始编纂了“道藏”，南渡后出现了不少新的道派，这些教派

都主张“三教合一”，至元朝时期，道教正式分为全真、正一两个重大派别，盛极一时。这些派别也从自己教派的立场出发，高举“三教合一”旗帜。元明以后，佛教与道教衰落，但理学勃兴。宋明理学的诞生，标志了儒学再一次改造，理学以孔子的伦理思想为核心，摄取了释、道的大量哲学思想和思维形式，使三者密切起来，难解难分。入清以后，儒、释、道没有重大的变化，影响及今。

II. “三教一致” — “三教鼎立” — “三教合一”

如上所述，儒、释、道三家一直是中国宗教史、思想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三个重要方面，它们之间的相互吸收又相互斗争的情况贯彻于中国整个历史过程当中，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场面。三者之间虽然在政治、经济和理论上的矛盾始终未断，但彼此之间的融合一直是发展的总趋势。“三教合一”除了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外，还有着自身理论的种种特点。封建统治阶级深深懂得，儒、释、道三家对维护封建统治这一根本任务是不可偏废的，三者有着各自的特点，在不同场合起着不同的社会作用，这正如清朝雍正皇帝在1731年所发布的上谕中概括：“域中有三教，曰儒、曰释、曰道。儒教本乎圣人，为生民立命，乃治世之大经大法，而释氏之明心见性，道家之炼气凝神，亦于我儒存心养气之旨不悖，且其教旨皆于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治化。”¹⁾在三教关系中，儒家一直处于正统的地位，他们宣传的“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立国之本，道统是维护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的精神武器，因之显得特别重要。唐太宗曾对他的群臣说：“梁武帝君臣性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国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是为戒。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²⁾太宗所说的梁武帝妄佛，甚至到佛寺舍身为奴，但是他在做皇帝后就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在《立学诏》(508)中说：“建国君民，立教(儒学)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这可看出梁武帝也懂得儒学对他治国的重要性。儒、释、道提出“三教合一”虽则都是立足于本教而融摄其它两者，但归根结底实行的还都是以儒为主，佛、道携手为辅的组合形式。

在印度佛教未传入之前，儒学占有显著的地位。在对儒学进行改革的经学中，我们就已看到儒学与黄老、刑名思想之间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吸收的情形。例如汉景帝时，《诗》博士辕固曾与道家黄生和窦太后辩论儒、道的高低和“汤武革命”的是非，窦太后发怒，令辕固与野猪搏斗，幸而辕固得到了汉景帝的帮忙，给了他一把好刀，最

1) 引自《龙虎山志》卷一。

2) 《资治通鉴》“唐纪”九。

后没有被野猪咬死。董仲舒最先把道家和阴阳家等等学说融合起来，使朴学(原始儒学)一变而成为“霸(黄老刑名之学)王(儒)道杂之”，合于西汉统治阶级需要的经学了，这可以说是儒、道融合的开端。

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依附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力图调合儒、道的矛盾，而且不断地援儒、道入佛，论证三教的一致性。例如在中国最早编译的《四十二章经》中就已掺入了很多儒、道思想的内容，该经一方面宣传小乘佛教的无我、无常和四谛、八正道，但同时也杂有“行道守真”之类的道家思想，以及“以礼从人”等等的儒家道德行为规范。又如中国最早的译师康僧会就是一个集儒、释、道三教思想于一身的代表，他在《安般守意经序》中写道：“心之溢荡，无征不泆，恍惚彷彿，出入无间，视之无形，听之无声，道之无前，寻之无后。”这与老子的“道”何其相似乃尔！因之有人在他的传记中说：“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³⁾由于“三教一致”、“儒释一家”的渲染，在社会风气上也蒙受影响，相传南北朝的傅翕(497-560)头戴“儒冠”，身穿“僧衣”，脚著“道履”，集儒、释、道于一身，表示“三教一家”。另外，传说中的“虎溪三笑”

(名士陶渊明、僧人释慧远、道士陆修静在庐山的会见)也成为后人的美谈。

道教提倡“三教一致”的思想始于晋时葛洪(284-364)。葛洪使道教思想系统化时，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所谓“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⁴⁾以后宣传“三教合一”思想的有梁朝的道士陶弘景等。陶弘景继承老庄思想和葛洪的神仙方术，融合佛、儒观点，认为“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他深居山野，时常接受朝廷的谘询，因此被称为“山中宰相”，在葛、陶之后，道家中人提到的“三教”的愈来愈多，论证也愈来愈深入。

从以上的例证中可以看出，儒、释、道三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过互相靠拢、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情况，这是主流的方面。但这种“一致”、“合流”并不能掩饰彼此之间的相互倾轧、排斥和斗争的另一面，三家之间的争论有时表现得很激烈，震动朝野，甚至发生流血的事件。在南北朝时期三家之间的相争熒熒大者有：在南朝宋文帝(424-453)时的儒家与佛教之间有关因果报应之争；齐梁之间的神灭、神不灭之争；宋末齐初(465-493)之间的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夷夏问题之辩；在北朝时由于佛、道斗争的原因所引起的北魏太武帝(424-452)和北周武帝(561-578)的二次废佛法难事件，以及北齐文宣帝时(550-589)展开的佛、道之间的倾轧，导致灭道的举措。

隋唐是中国统一的封建帝国创建时期，幅员辽阔，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缤纷，儒、释、道在这个时期都有重要的发展，进入了繁盛时代。纵观这个时代，由于各代帝王主观信仰的不同，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儒、释、道的态度有所不同，或抑或扬，但总的说来，是采取扶掖、支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儒、释、道虽然在意识形态从而在

3) 梁《高僧传·康僧会》

4) 《抱朴子·释滞》

政治上呈现出鼎立的局面，但三教为了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和迎合大唐帝国的大一统统治之政治的需要出发，也不时提倡“三教无阂”、“三教归一”或“会三归一”等等。“三教鼎立”的重要表现是：隋开皇(581-600)年间的三教辩论大会；大业(605-618)时令沙门、道士致敬王者而引发的斗争；唐武德(618-626)年间的儒道联合反对佛教的斗争；贞观(627-649)时的释、道先后之争；高宗的多次佛、道大辩论，高宗、武后和中宗时的“老子化胡说”之争；唐中后期多次举行的佛、道大辩论；武宗时的灭佛；韩愈等儒者的反佛、道思想等等。与此同时，三教中提倡“三教合一”的也不乏人。在儒学方面，有隋唐的王通，他曾呼吁“三教合一”；韩愈、李翱虽然在政治上反对佛教，但他们把佛教的心性学说和法统观加以改造，提出了儒学的道统说和复性论，因之有人讥讽他们是阴释阳儒。柳宗元虽然批判佛教的中观是“妄取空语……颠倒是非”，但他仍然认为：“浮图仍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⁵⁾。

佛教在隋唐时期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个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翻译和注解佛经的工作，不少僧人常常把佛教的思想比附儒、道，为此撰写了不少宣传中国伦理纲常的佛教经典，在僧侣队伍中还出现了很多“孝僧”、“儒僧”等等。中国的佛教宗派是在摄取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天台宗把止观学说与儒家的心性论调和起来，甚至把道教的“借外丹力修内丹”的修炼方法也引进了佛教。华严宗五祖宗密不仅认为禅、教一致，还进而认为儒、释同源。他写道：“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策勤万行……三教皆可遵行”⁶⁾。禅宗是一个典型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它在坚持佛教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将老庄的自然主义哲学、儒家心性学说融入自己的禅学中去，从菩提达磨的“与道冥符”到神秀的“观心看净”都可以看到老子“静观其道”、“静心致远”的思想痕迹，从慧能的“能所俱泯”中我们可以联想到庄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

唐朝开国的几个皇帝都笃信道教，在他们的统治下，三教发生过一些齟齬，但到玄宗时已改变了这种情况，三教关系又开始融洽起来，并得到了发展。玄宗对待三教关系的原则是“会三归一”、“理皆共贯”⁷⁾。他的宰相张九龄向玄宗报告说：“至德法天，平分儒术，道已广其家，僧又不违其愿，三教并列。”玄宗批答：“三教无阂”⁸⁾道教中玄派的代表人物如成玄英、李荣、王玄览等都援庄入老，援佛入老，通过对佛、老的巧妙结合，发展了道教的教义，对后世有重要的影响。

宋元以后，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洽关系日益见深，“合一”的思潮蔚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南宋偏安后，南北出现了对峙的局面，因而在道教中也出现了龙虎、天师、茅山、上清等派，暨其分支，这些派别大都提倡“三教平等”、“三教一

5) 《送僧浩初序》

6) 《华严原人论》

7) 《曲江集》卷十五.

8) 《曲江集》卷十五.

源”的思想，并在道教的哲理和实践中摄收了很多儒、释的内容，其中最突出的是金丹派南宗的祖师张伯端。他以修炼性命说会通三教，说：“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奈何后世黄缙之徒各自专门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没邪歧，不能混一而同归。”⁹⁾他提倡的修炼方法是：“先以神仙命脉诱其修炼，次以诸佛妙用广其神通，终以真如觉性遣其幻妄，而归于究竟空寂之本原。”他的修持方法明显地是三教的结合。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王重阳(王吉吉)在金大定(1677-)年间创立的全真教。王重阳和他的弟子鼓吹“三教归一，义理本无二致”的思想。王有一首诗可以道出他们的信仰：“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相通”。但是全真教道士高唱的“三教同源”与南北朝时期鼓吹的已有不同，前者着重于融通三教的核心即义理方面，特别是道、禅的会融；后者则是从劝民从善的社会作用方面着手。

在宋明时期，儒学经过了第二次改造，出现了理学。宋明理学包括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理学仍然以孔孟创导的伦理思想为核心，它虽然竭力排斥释、道，特别是释、道的出世主义与虚无主义，但实际上仍然“出入于儒道”。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中明显地可以看出吸收了释教的“空有合一”的本体论，“顿渐合一”的认识论，“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修持观等，因之有人说是“阳儒阴释”，或者“三教合一”的新形态。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自称是“穷禅之客”，他的著作《太极图说》明显地是三教融合为一的代表作。二程主张“性即理”，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并通过内心的修养功夫来“窒欲”，以恢复天理，这明显地受到过佛教心性论和禅宗修持方法的影响。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是竭力排斥佛教中的一个人物，但是在他的哲学思想中，无论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修持方法无不打上佛教的烙印，有人说他是“阳儒阴释”，“表儒里释”，他自己也感叹说，佛教的“克己”，“往往我儒所不及”¹⁰⁾。王阳明是“心学”的主要代表，通观他的“良知”道德本体论及“致良知”的修养方法，与禅学的佛性论及修持方法有着很多相通之处。禅宗提出“人人悉有佛性”，王也提出“人人皆有良知”。禅宗的修持方法是“不住经教”，“不立文字”，直指心源，有顿渐之分。王阳明也说“六经是我心是记籍”，“不要揣摩依仿经典”，在修习的方法上有“顿悟之心”，因之后人评议说：“阳明的良知说是‘以禅之实，而托儒之名。’”¹¹⁾综上所述，理学派的“援儒入佛”、“儒道契合”使儒学在很大程度上佛学化、禅学化、道教化，使三教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小，终至蔚成一源。

9) 《悟真篇序》

10) 《朱熹语录》卷二十。

11) 《渔堂文集·学术辨》

Ⅲ. “三教合一”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

“三教合一”的思想不但对中国古代和近世的哲学、宗教、教育科举、科学、医学等等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文化思想的其它领域，诸如雕塑、绘画、戏曲、小说、诗词等也有过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关于三教的绘画和造像，我们目前在四川重庆大足石窟、山西的悬空寺、平顺的宝崖寺、云南的圆通寺和甘肃庆阳平定川石窟等等中都能见到，在这些寺窟中时代最早的、最为集中的是四川大足石窟三教造像群。大足石窟共有三教造像区9处，其中三教像有分龕、同龕、融溶像、混杂像等等各种形式。大足石窟始凿于北宋，盛于南宋，最早所见的造像是北宋1088年所造，最迟的是清末民国所塑，但值得注意的是，未见有唐代的造像这与全国的情况相似。¹²⁾其中最著名的是石篆山摩岩造像。这群造像凿于北宋，儒、释、道三教内容俱全，编号6号为孔子及十哲龕，龕中刻孔子正襟危坐像，其右立十大弟子，皆儒雅彬彬，风度翩翩。7号为三身佛龕，主像为毗卢舍那佛、卢舍那佛和释迦牟尼佛之三身佛像，造像慈眉善目，俯视人间，具有悲悯度世的气息。8号为老君龕，中刻老君像，其左右列真人像，皆仙风道骨，引人沉思。这是中国石刻艺术中的瑰宝，也是中国儒、释、道三教历史的见证。“三教”对中国的绘画，特别是壁画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中国不少地方都保存着一批石刻壁画，甚至无锡灵山祥符禅寺近年还新镌了一块巨型石刻三教画屏，名士、高僧、高道聚集在一起，阔谈天下大事。中国各个时代都出现过绘刻三教或道、释画的著名画家，例如唐朝的曹仲玄，擅绘道、释壁画，时人称为“道释人物第一”。明朝的戴进(1388-1462)“画道释用铁线描，间亦用兰叶描……绝技出南宋以后诸人之上，为有明画第一。”¹³⁾在中国的诗歌和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三教合一”的主题，或三教人物形象。中国的著名诗人谢灵运、苏轼、苏辙、范成大、颜之推等人都写过有关“三教合一”的诗歌或评论。例如晋宋之际的诗人谢灵运写道：“释氏之论，圣道虽遥，积学能至……孔氏之论，圣道既妙……理归一极……道家之唱，待意之说，敢以抑中自许”¹⁴⁾。苏东坡也写道：“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¹⁵⁾。在明清之际，中国各地出现过很多民间的劝善书、箴言录或功过格，如《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为善骈文》等等，这些书籍同时宣传儒、道的“积善销恶”和佛教“因果报应”等思想，在民间广为流传，在社会上有着强烈的影响。

12) 阎文儒在《中国石窟艺术总论》中列举全国13省100余座石窟中，未见一座隋唐“三教合一”造像，这个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13) 《中国画家大辞典》，北京中国书店版

14) 《与诸道人辨宗论》

15) 《祭尤进辩才文》

IV. “三教合一”对中国周围国家的传播和影响

韩国、朝鲜、日本、越南都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远在二千年前或更早的一些时候就与中国发生过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关系，随着儒、释、道三教传入这些国家，“三教合一”的思想也在当时发生了影响，它与当地的民间信仰、文化结合以后，孕育了很多新的思潮，在文学艺术中更开出了绚丽的花朵。

公元前一世纪前后，韩半岛及其周围出现了百济、高句丽、新罗三国。中国的儒学开始传入，尔后，佛教的各个派别也相继在韩半岛传播。道教思想是在4世纪时开始传入百济，但道教正式被引进高句丽要在7世纪以后。儒、释、道三教传入韩半岛和中国一样就开始溶合起来，不过韩国的融合还要加上韩国的民间信仰——神教或萨满教思想和实践。儒、释、道最早汇合见于6-7世纪新罗出现的花郎道，花郎道也称风流道，它是以修养为目的的武士团体，花郎制后来成为国家制度以后，还一度成为国家的最高宗门。这个团体在仙教的基础上，把儒家的忠孝，道教的无为和佛教的积善思想融合成一个具有民族伦理特点的道德观，以此来培养忠君爱国的思想，这种思想正如韩国古代的大学者，在中国多年学习、生活的崔致远所概括：“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争，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¹⁶⁾。

儒、释二教传入韩半岛较早，道教次之。据《三国史记》载，高句丽荣留王在位时曾遣人入唐求学佛、老法，唐高祖许之。在宝藏王执政时(642-)，宰相盖苏文当权，他在643年给宝藏王的报告中说：“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盛，非所谓备天下之道术者也，伏请遣使于唐以训国人，大王深然之”。后来唐朝道士叔达等8人应请去高句丽，备受款待，这是高句丽朝廷对“三教合一”的重视。

14世纪李朝建立后，独尊儒术，在以后的500年间，朱子学或性理学一直在韩国处于绝对统治的地位。韩国的朱子学追踪中国的宋明理学，李朝的朱子学开展了数百年“四端七情”之争，但其实质也是三教的混融，是在韩国特殊社会条件下的独特表现形式。李朝末年，韩国在西学的冲击下，出现了东学运动，东学是针对天主教的西学而言的，它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社会思潮，它的教理和实践是把儒、佛、道(包括道教的阴阳五行思想)的思想加以折衷调合而形成的，东学天道教的首创者崔济愚在他的《东经大全》中曾称：“我道兼儒、佛、道三教，圆融为一，主五伦五常，居仁行义，正心诚意，修己及人，取儒教(孔子)；以慈悲平等为宗旨，舍身救世，洁净道场，口诵神咒，手执念珠，取佛教(释迦)；悟玄机，蠲名利，无欲清净以持身，炼磨心神，终末升天，取道教(老)”。

16)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此外，在韩国民间流传的、作为韩国民族宗教的“神教”，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吸收过儒、释、道的思想，“神教”是在19世纪初出现的派别一宗教，它的教理是在原有的“神教”基础上揉合佛教的明心见性，道教的养气炼神和儒家的理气学说而建立起来的，宗教迄今还有它的影响。

“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古日本也有长远的影响。日本自5世纪初传入儒学后，6世纪中叶佛教也经过韩国传入日本。道教何时传入，目前学术界还有种种说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中国六朝时期，东渡日本的汉人已经陆续把道教思想和行事传入日本。日本的神道教在当时接触中国道教之后，才渐趋定型。在大化革新时期，圣德太子颁布的《十七条宪法》及“冠位十二阶”里明确地有着儒、释、道融合的倾向。十七条宪法的主要根据是儒家的思想，如“以和为贵”、“以礼为本”、“信是义本”、“使民以时”等等，也有佛教思想，如“笃信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另外，老庄思想的痕迹如“绝矜弃欲”、“绝念弃嗔”等也可以从中追索。大化革新以后，“三教合一”思想似乎仍在传播，例如元正天皇于721年发出的诏书中说：“周孔之风，尤先仁爱，李释之教，深禁杀生”¹⁷⁾。

儒、释、道三教对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神道教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古代，外来的宗教释、老、儒传入日本后，便与神道结合起来。到13世纪，神、佛融合的教义形成了体系，迄南北朝时代¹⁸⁾，出现了以神道为核心，援入儒、佛、阴阳道的理论为信仰基础的伊势神道。在中世纪时末产生了吉田神道，这个神道宣称：道教所谓老子大元说的大元尊神—国常立尊是宇宙的本源。神乃万物之灵形成人心而普遍存在，心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并从佛教《法华经》那里吸收了“正法”的说法。总之，儒、释、道三教的思想显然被吉田神道吸收进去了，但只是作为润饰，增添光彩而已！到了近世神，儒融合的民间神道和教派神道相继产生，这些神道随着朱子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体系，融入了儒家的学说，例如垂加神道是以理学为主，倡导“天人合一”和大义名份的封建伦理道德，另外还揉合了道教的阴阳五行学说。

宋明理学从13世纪传入日本后一直依附于佛教，到江户时期，在德川幕府的支持下，开始从佛教中分离出来，但分离出来的儒学仍然杂有释、道的成分。日本近世儒学体系主要为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和古学派，这三个学派都以儒教伦理道德学说为核心，提倡封建名分和尊王攘夷的思想，但不同于中国的是，有些人常常把理学与神道思想结合起来，因此使理学不但佛、道化，而且神道化。

越南是和中國思想文化交流最早的一个国家。远在公元前后，儒、释、道思想就相继传入越南。在越南传播“三教一致”思想的首推牟子，他在汉末三国中原战乱濒仍时去交趾避难，牟子所著的《理感论》最早表达了儒释、道三教一致的看法，他认为

17) 《续日本纪》卷八“养老五年”(721)条。

18) 指1335年到1392年日本分成了南北两个朝代。

，道家的真人和儒家的三皇五帝是相匹配的。佛教的教义和儒、道的学说也有共同之处，当有人指出道家之“道”

与释迦之教有异时，他回答说：“天道法四时，人道法五常……道之为物，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废而不同，消而不离，子不解之，何异之乎？”¹⁹⁾

10世纪越南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吴、丁、黎三朝虽然享国很短，但都奉行三教并举的政策。李朝统治200年间，有的皇帝崇佛，但对释教也很宽容，儒、释、道三教有用之才都能参加国家考试，并在朝廷任职，因之三教相安，无大冲突，史书赞不绝口，例如：“(李仁宗)天资睿武四年(1123)十一月还京师，儒、道、释并献贺诗”²⁰⁾。“(李高宗)天资嘉瑞十年(1195)，初试三教，以儒、道、释试士，中者赐出身”²¹⁾。继李朝的陈朝也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陈太宗开国一再试三教诸科。如《越史通鉴纲目》记：“陈太宗天应政平十六年(1247)秋八月，试三教……，复试通三教诸科者，亦以甲乙分之”²²⁾。但至陈朝末年黎朝开国时便独尊儒术，在后黎期(1428-1784)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黎圣宗颁布的《二十四训条》及黎玄宗颁行的“申明教民四十七条”都是儒者治国的纲领和行为轨范。黎朝最著名的理学家阮秉谦(1491-1585)揉合宋儒老庄及佛学，追随中国北宋邵庸的象数之学，影响极大。

越南和中国一样，儒、释、道一体的思想和实践常常为民间宗教和信仰所吸收，在社会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高台教就是明显的例子，该教不但奉祀佛陀、老子和孔子，也崇拜李白(道教)、观世音和广成帝君(儒教)等等。对三教一体崇拜的民间信仰团体在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也有众多的存在。

《 參考文獻 》

《龙虎山志》
《资治通鉴》
《高僧传·康僧会》
《抱朴子·释滞》
《送僧浩初序》
《华严原人论》

19) 《弘明集》

20) 《大越史记》卷二.

21) 《越史通鉴纲目》

22) 《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六.

《曲江集》

《曲江集》

《悟真篇序》

《朱熹语录》

《中国石窟艺术总论》

《渔堂文集·学术辨》

《中国画家大辞典》

《与诸道人辨宗论》

《祭尤进辩才文》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续日本纪》

《弘明集》

《大越史记》

《越史通鉴纲目》

《越史通鉴纲目》